

● 中青文库 ●

新启蒙话语建构

《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

梁 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青文库 ●

本书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新启蒙话语建构

《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

梁 鸿◎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梁鸿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61-0903-8

I. ①新…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359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杜丽延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39千字
定 价 4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回到语文学	(1)
----------------	-----

上卷 1990 年代文学关键词

第一章 “狂欢”:大众文化的兴起与 1990 年代文学的发生	(21)
第一节 大众文化与 1990 年代的文学场	(22)
第二节 被不断构造的“狂欢”叙事	(26)
第三节 “身体狂欢”的僭越与困境	(33)
第二章 “精神危机”:1990 年代初期社会精神状况的话语分析	(39)
第一节 主流意识形态的悖论及其规约	(40)
第二节 知识分子话语的“拘囿”与“被拘囿”	(46)
第三节 被剥离了精神价值的世俗与技术	(51)
第三章 “民间”:“断裂问卷”与 1990 年代文学的转向	(56)
第一节 “民间形象”、“民间立场”的建构	(57)
第二节 感性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兴起	(63)
第三节 “民间”、“个人”与“历史”的可辨析性	(68)
第四节 作为“行为艺术”的“断裂问卷”	(72)
第四章 “王小波之死”: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建构及其未完成性	(75)
第一节 “自由知识分子”:启蒙新传统的设想与标本	(78)
第二节 “受难者”与“文学先锋”:世纪末青年的精神救赎	(84)

第三节 “自由分子”:精英中产阶级的象征符号	(90)
第四节 重回1990年代:自由的“窄化”与“泛化”	(94)

下卷 《受活》与“中国想象”

第五章 时间	(103)
第一节 六月飞雪:“异”的象征世界	(103)
第二节 天干地支年:中国的轮回	(110)
第六章 地点	(118)
第一节 受活庄	(118)
第二节 “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	(128)
第七章 人物	(140)
第一节 茅枝婆:巫婆的筷子竖不起来了	(140)
第二节 柳县长:中国式病症	(145)
第三节 绝术团:“残缺之躯”及其隐喻	(152)
第四节 被困的“列宁遗体”	(169)
第八章 事件	(176)
第一节 三个前事件	(176)
第二节 “算账”与“经济”话语的变迁	(184)
第三节 发展、现代性与乌托邦	(192)
第四节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205)
第九章 现实与主义	(219)
第十章 结局	(234)
参考文献	(240)
后记	(245)

绪论：回到语文学

一 重回语文学

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阐述了文学批评“回到语文学”的重要性，“一种真正的语文学阅读是积极的，它包括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辞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那么，从这种语言观看来，言辞不是被动的标记和记号，谦逊地代替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相反，它们是构成现实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①。依据《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文学（philology）专门用来指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分析。广义的语文学有时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②。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文学是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以语言研究为对象，但语言并不是其唯一重点，“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这头一项任务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的研究，到处运用它自己的方法，即考订”^③。语文学重点关注语言中的文学、历史、文化等信息，因此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而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则被称为“自然科学”。在中国学术界，语文学时期主要指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的训诂学，着重于注释古代典籍，晚清以后才开始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很显然，在萨义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② R. R. K. 哈德曼、F.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页。

德这里,“语文学”既指对“语言”进行训诂,即考证、解释语言的生成,但更多地指向对语言背后所蕴涵的历史内容进行分析,“语言是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它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政治史”,在此意义上,语言必然能够映照出一个民族历史的生成、情感的变迁、经验的积淀和政治制度的逻辑,等等。

在欧美的语言学发展史上,起初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传统,认为语言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自近代以来开始形成人文主义传统,关注语言(主要是语义)与文化、思维的关系。17世纪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通过典型融合考察并展示一个民族的性格、生活方式、兴趣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的,将提出一种真正的哲学问题。”^①通过考察语音(voix)的变化,他发现,“随着需要的增加、人事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②,18世纪人文主义语言学的重要代表赫尔德提出,“语言是民族的镜子”,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的工具,还是思维的形式和仓库,在语言中沉积着一代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实质上,他已经萌生了民族语言形成一种世界形象的新观点。^③而《新科学》的作者维柯认为,语言产生及变迁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变迁的标志,由此,他提出话语的比喻理论,认为语言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幻象和比喻认知。

萨义德认为,重回语文学,就是重回人文主义,通过对语言的溯源重新回到历史生成之初,去寻找那言词背后的“历史生成”,“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

①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参考徐志民《欧美语文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1页。

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①。

如果回顾萨义德的学术史——《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最后的天空之后》等著作，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语文学”和“人文主义”具有特别的含义，即从自我身份和文本所涉及的自身语言传统出发，对身处的世界、文本和文化进行交互性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学者的自我身份——对他自己而言，是“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混合状态——对学术思考的影响。这里的“人文主义”并非指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指一个学者以语文学为切入口，在对文本语言的词源学分析基础上，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正是以此立场，他写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论著。他把“东方”看作是“西方”的“他者”的建构，^②并敏锐地发现加缪作品中所隐藏着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法国形象”，它表现在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土地上阿拉伯人的空缺描述中，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和没有主体性的符号存在。^③

笔者感兴趣的是萨义德对文学批评通向“人文主义”的独特界定：语言和自我身份。前者是通往人文主义的方法与途径，后者是论者的情感起点和理性起点。“从字面上讲，语文学就是对话词（words）的热爱，但是作为一种训练，它在所有重要文化传统——包括构成我自己成长环境的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各个阶段，都获得了一种准科学的知性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尽管后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批判萨义德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分析方法，但《东方学》对理解世界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的起源的确有启发性。

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加缪在他的小说或叙述性作品中讲述故事，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或者被表现为超出叙述之外，一种不受时间与诠释所限制的形象（如娅宁）；或被表现为唯一值得作为历史加以叙述的历史。”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5页。法国在加缪的小说中被视为超稳定结构，是终极的正确。这表现在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土地上阿拉伯人的空缺描述中，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和没有主体性的符号存在。从中国的当代文化结构中，西方文化也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自身民族性格时，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非主体性和模糊化的倾向都使得“西方”成为萨义德所言的“一种不受时间与诠释所限制的形象”，是一种元结构和判断自身存在的基本依据。

和精神的声望……所有这一切包含着赋予语言的一种细致的学术关注，认为语言在其自身之内承载着它确实可以或者实际上并未承载的知识。”^①对于文学批评者而言，重回语文学首先意味着重新把目光投向语言、词语和文本本身，从对语言的持续关注 and 追索中发现文学内部所透露出的幽深的时间和空间，这不只是因为语言可以发掘历史，而是因为“构成民族的正是语言”，“语言就是一种历史文献”。^②重回语言和言词，意味着重新进入语言所产生的民族历史与时间之中，在对语言的探索中寻找历史。在此过程中，语言所蕴涵的深远信息慢慢浮出地表，其中包括它的氛围、流转，它的对抗、妥协，它的转喻、象征，等等。探讨语言的生成过程和使用方式，也即重新回到历史源头，去寻找被遮蔽在时间深处的真相。这也是一种批判主义的学术态度。

对语言的探询逐渐指向自我的历史生成和现实存在。学者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固然可能带来思维的褊狭和某些盲点，但对那些致力于思考与自身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学者来说，这应该是个基本前提。否则，就无法找到思考的原点和启动点，更无法穿过迷雾一样弥散在自身周围的现象去寻找最核心的问题。鲁迅在对国民性、传统性等所有问题的思考中都是从“我”出发，首先基于对“我”的追问和怀疑，因为“我”也是这一历史构成的一部分，梁漱溟、王国维等一代学者都具有这样的自我感和历史感。萨义德究其一生思考自己与阿拉伯传统、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失去家园的阿拉伯人，一个在美国精英文化中拥有地位的人，一个伊斯兰传统中长大但却是基督教徒的人，等等，这多重身份和多重文化的矛盾既是他生存的真实状况，也是他思考世界的起点。德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并不回避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由此出发，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种种问题，这一出发点反而使她的认知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和穿透力。日本当代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序言中第一句话便这样说：“从我们自身的体验中去追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12页。

寻，何谓20世纪的‘近代’、何谓‘亚洲’乃至‘日本’？这是我作为思想史学者的使命。”^①以追究“自我形象的生成”起始，这是子安宣邦思考近代日本的生成的基本经验起点和伦理起点。

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里，重回语文学也许是最基本的方法，对语言的考察正是把被遮蔽的历史不断敞开并和当代不断对话的过程。

从本质意义上讲，文学即对语言的重新使用，它以修辞手段使语言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产生对话和歧义，“赋予文学的特性是，它邀请读者进入与言词之间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关系之强烈程度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对话”：即发现，使语言超出它固定化的含义，陌生化、复杂化、矛盾化，因为“文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表达形式都更多地解释了对于日常生活行为中每个人都在分享、每个人都在使用的东西，此外，对于在其自身及其词汇和语法之中，极其微妙然而也可以觉察地包含着一个社会管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之统治思想的东西……”^②对文学语言的重新释义，也是从中发现被遮蔽的思想，发现民族历史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运行方式的过程。

对文学文本语言、词语的追问，可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起点，同时，也是最具乡愁性和人文主义的起点。

二 文学作为“公共想象”的本质

重回语文学，并非意味着回到新批评的系统中，也并非仅仅提倡关注词语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和审美能量，进而关注文学性的产生及其通道。恰恰相反，它是试图以文学语言本身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和现实冲突为基础，让文学重回公共空间，重新与民族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处于积极的对话之中。

①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查理·鲍里尔语，转引自爱德华·W.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重回文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想象能够为一个民族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创造、想象新的空间，这是文学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性的最大体现；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强大，而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却在日渐萎缩，这直接导致民众公共精神的减弱和丧失。文学与政治、经济相反，后两者致力于使社会秩序化、标准化，增强其可控制性，尽可能使其“简化”，而文学则要充分展示社会生活及人类内在的复杂性和被压抑性——丰盈的、含混的、痛苦的，同时又活生生的存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自198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似乎很少愿意再提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想象”作用，很少提文学对政治的影响。经过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还尚未发育成熟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强劲洗礼之后，经过当代系列文学思潮对“文学性”的反复窄化之后（虽然这一“窄化”倾向有非常复杂的文学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在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自动放弃之后，文学所蕴涵的“公共想象”的含义似乎变得暧昧不清，并被驱逐到它的本质属性之外了。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是文学思潮的命名者和推动者，但却缺乏对文学“公共性”的澄清意识与总体思考。

昆德拉在阅读《包法利夫人》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判断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能仅仅根据其思想和理论概念，而不考虑其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也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历史的绝对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在一个如此推崇科学思想的世纪中，这是最伟大的发现。”^① 一部优秀的作品除了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格、想象世界之外，它还应该包括对当代社会的积极反应，甚至包括某种鲜明的政治态度，对整个社会生活、现实存在和具体事件的反应，文学从来不可能排除其“政治性”（广义）的属性。科学为了实用，哲学倾心于总体原则，而文学却致力于把人心的混沌、复杂和文明发展的另一面给展示出

^① 米兰·昆德拉：《耶路撒冷讲演：小说与欧洲》，《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来，它告诉人们“世界并非如此”，在此，文学发挥了它的公共想象能力，让民众产生新的思想维度，质疑、批判，或重新思考文明、制度的种种。卡夫卡的《城堡》让我们感受到现代官僚制度的可怕及对生命的压抑，加缪的《局外人》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的人的“异化”，它们都展示了文学想象在现代社会、公共想象中的位置。福楼拜，包括狄更斯、雨果等人的写作时期正是资本主义文明在欧洲的上升时期，科学、技术、理性成为时代的最高原则，但是，文学却颠覆了这一基本的想象，它让我们发现了这一原则的“愚昧”和“可怕”，从某种意义上，也动摇了这一时代的总体精神原则。美国诗人惠特曼认为，诗人是“复杂事物的仲裁人”，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他的强大想象力“看出永恒就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而“不把男人和女人看得虚幻或卑微（dreams or dots）”。对此，美国当代学者努斯鲍姆认为，“惠特曼对公共诗歌的呼唤，在这个时代仍然和当时一样恰当。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我们深深缺乏能力去把彼此看成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把彼此看成‘虚幻或卑微’的人。由于极端信赖技术化的方式，尤其是信赖用源自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来为人类行为建立模型，助长了那些对同情心的拒绝”^①。

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和公共精神的逐渐萎缩是与18世纪欧洲工业文明大规模地发展相伴生的存在。早在1749年，卢梭就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认为科学已经损害了人类的道德。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如维柯、斯宾格勒、尼采、雅斯贝斯、阿尔都塞等人，无论什么派别的哲学家和各科学者，他们对“技术”都持基本的反思立场。如雅斯贝斯对“技术实用主义”特别反对，“相关的知识可以通过对与这种知识有关的方法的实用性研究来获得，而这种知识则可以作为结果而被简化为最简单的形式……每个人仅仅在一种事情上是专家，他的才能范围通常极为狭窄，并不表现他的真实存在，也未将他带入与那个超越一切的整体关联中去，而后者乃是一种经过修养的意识之统一体”^②。每个人只与自己相关，

①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而没有把人类作为“整体的关联”，从而缺乏公共精神，这也正是汉娜·阿伦特在考察“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所思考的起点。作为纳粹党一个普通的看守，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所有的残杀行为都只是因为他要“遵守命令”，他把这一职责看作是最高原则，阿伦特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庸人之恶”。她认为，现代社会缺乏公共领域，每个人只考察自己的技术职责，技术理性成为最高的标准，而不去关注信仰和道德，不关注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人类“整体的关联”，这恰恰反映了现代性的危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通过分析犹太民族的历史和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传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危机——公共领域的衰落，每个人处于“隔绝”与“孤单”的存在状态，丧失了“生活之共同世界”感。阿伦特没有把纳粹事件看作是历史的异常事件或者偶然事件，而是把它视为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一直存在于现代性之中的矛盾特性直接导致了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崩溃。因此，如何重建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如何重新恢复人的“整体的关联”意识，这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以其巨大的想象力和丰富性扮演了“抵抗”和“揭露”的角色，“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唯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①。无论是欧洲——包括中国——的中世纪、近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文学审查制度和对文人的迫害（如英国著名的 D. H. 劳伦斯的《查太勒夫人的情人》案），毫无疑问，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文学所具有的争议性和颠覆性。它能够激发人们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新的理解，能够提供对社会、人心的新的想象。努斯鲍姆把文学想象在公共生活中的这一作用称之为“诗性正义”，这是“一种建构在文学和情感基础上的正义和司法标准”，“文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敌人：一项无所不包的致力于将所有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都囊括在‘表格形式’中的科学工程。文学在它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中表达了一种与政治经济学文本包含的

①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38 页。

世界观不同的生命感受；而且，伴随着这种生命感受，文学塑造了在某种意义上颠覆科学理性标准的想象与期望”。^①

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而言，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就“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这一论题而言，它所呈现的问题与欧洲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封建帝制的中国缺乏“公民”的存在，所以，几乎没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但是在儒家文化氛围内，民间生活却自有一套文化传统维持着基本的道德信仰，这是每个民族之人的原型结构，也具有某种公约性，有论者把它称之为“以家族为本位的儒学式公共空间”^②。帝制推翻、民族战争、内战、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对欧洲文明的模仿期和复制期——通过启蒙导入科学和民主意识，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逐渐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并建构公民社会，但也逐渐陷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怪圈。中国原型意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自我价值”这一概念的设想主要集中在金钱与自我层面，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看似扩大，实则消失，因为整个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丧失了“整体的关联”意识。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学家们一直以有意识的姿态“介入”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建构中。鲁迅的“批判国民性”、郁达夫的“性启蒙”、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创作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想象新的中国人生和中国生活提供了基本起点。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批判性想象都是建构在对语文学的热切关注上。鲁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还有很多杂文都是在对中国古代的诗、小说、画、道德、礼俗的充分研究和理解基础上进行的，他解释“二十四孝图”，分析民间戏中的“女吊”、“无常”，戏谑“老子”、“孔子”，等等，所有的书写都不是为了“确证”或再次确立权威，而是通过重新塑形，而达到萨义德所言的“颠覆、质疑和

①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页。

②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44 页。

批判”的目的。它们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警惕态度，并且致力于挖掘生命、人心的复杂存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它还面临着怎样“介入”和怎样理解“介入”的问题。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对政治的“绝对服从”使得文学对公共的想象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等作品中察觉到它们背后的游移性和自生性。而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更可以充分感受到文学“公共想象”能力的强化和弱化，它们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之中。

当代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公共想象”能力一直没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在谈到这一方面时，总是把“公共想象”、“公共性”等同于文本的“政治性”和“现实主义性”，这是一种窄化理解。文学的“公共想象”当然包含它对政治制度在民族生活中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包含对人性、人生、情感与文明、文化的新的阐释与想象，包含它在多大程度上开启民众的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但同时，也包含更为具体的如关于人、阶级、国家方面的争论，关于法律、经济等方面制度的设计方面的“想象”，它对某一制度的可能的“参与性”，等等。所以，从操作意义上讲，关注、分析文学的“公共想象”和“公共性”作用甚至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正如努斯鲍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狄更斯《艰难时世》对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的现代经济学的批判与讽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包含了一幅关于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政治想象的标准图景。很显然，它提出这种标准是将其作为尖锐的讽刺对象”，她认为《艰难时世》给人们发出了一种警示，“如果经济学的政策制定不承认每一个人类内心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不承认它的抗争和奋斗，它复杂的情感，它为理解而付出的努力和恐惧，如果经济学的政策制定不能把一个人的生命和机器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它管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主张提出质疑”^①。由此，努斯鲍姆认为，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部分，应该成为司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的

^①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潜在裁判之一，这正是她所谓的“诗性正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这既是一种跨学科的，但又是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析，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文学批评可能达到的方向，即对文学所具有的“公共想象”能力的多向度的分析。

三 作为方法的“乡愁”

把“乡愁”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论上的术语，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一词语包含着过多感性的成分，伤感、追忆、美化、怜悯，等等，都是“乡愁”的基本内容，很难从方法论上加以把握。而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发展语境中，“乡愁”还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的指向，因为这里的“乡”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故乡”，而且还是非常具体的“乡村”、“乡土”和“传统”。把“乡愁”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背向现代性发展的方向，这一“背向”会带来单向度思维的可能性，会形成二元对立式的态势。这是作为方法论的“乡愁”所具有的本源缺乏，具有消极意义。但是，这些“消极”因素却恰恰是笔者所想作为“积极”意义来使用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给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启发性，子安宣邦依此提出“作为方法的日本”和“作为方法的江户”，即把“亚洲”、“日本”、“江户”作为一种生成性的存在，而不是本源存在，去考察这一存在的意义的起源、流变，以此来考察近代亚洲的生成和日本的生成。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程光炜提出“作为方法的1980年代”^①，把“1980年代”去神话化和去精英化，以此重新探索1980年代文学和文化的生成。这里面，既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譬如“溯源论”和“结构关系论”，也有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②。

① 程光炜：《文学讲稿：“1980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路易斯·沃思：《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那么,“作为方法的乡愁”这一提法是否成立?“乡愁”不是一种实体存在,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定,它是自古以来产生于任何离家怀乡之人的头脑的情感。但是,如果把这一概念限定于自现代社会诞生工业文明发展以来,它就有了某种实在的含义。在这里,“乡愁”不只是一种超越于时空的情感存在,同时也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生物。所谓的“乡愁”是在现代性发展观照下的“乡愁”,只有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才能考察它所代表的时间维度和心灵指向的深层原因,“乡愁”才有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因此,“乡愁”既是一种具体的精神指向,也是一种“方法”。

“乡愁”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产物。它不是一种终极价值,而是一种思维的起源。现代性是向前的,属于未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①。而“乡愁”则是回望性的,是属于“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柄谷行人从勒南(Ernest Renan)的文章《什么是民族》中得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结论:“勒南表示,民族并非根植于‘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亲近感、地理或军事的必要性’中的任何一项。他认为民族根植于所共有的光荣与悲哀、其中特别是悲哀的‘感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民族的存在基于同情(sympathy)或怜悯(compassion)。不用说这是历史性的东西,表现在浪漫派的‘美学’中。这并非为西洋所仅有,本居宣长也是以‘物哀’这一共感为出发点的。假如美学是指‘感情’优越于知识、道德而为最基本的东西的话,那么,本质上民族就是‘美学’的。”^②换言之,如果说民族是以“美学”的方式而生成,共同的光荣、悲哀、愤怒,那么,包含在这一“美学”中的情感、乡愁、自我则应该是我们思考民族存在时的基本起点。

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以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则是要以此感受文

① 波德莱尔:《现代性》,《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②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发生》,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1页。